

## 鄧小平與 1959 年廬山會議

鍾延麟\*

### 摘要

1959 年的廬山會議，因彭德懷的上書而引發中共黨內重大的政治鬥爭。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鄧小平，雖因健康原因而無與會，但是面對此一緊要的政治攤牌，鄧自不可能置身事外。在文獻分析與訪談的基礎上，本文論點為：廬山會議前，鄧小平因腿傷而住院，但對外仍消息靈通；會議期間，鄧小平對於會議情勢與發展，除可能透過閱讀文件知情外，或也作為徵詢意見的對象。鄧小平對會議結果與結論表態的情形，現有資料多是在會議結束之後，然不能排除其在會議期間即有表態支持的可能。促使鄧小平支持會議結果的因素包括：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權力結構的限制，鄧小平對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矛盾的認識，以及彭德懷相關做法本身的爭議性。本文既對「鄧小平研究」與相關中共黨史的認識有所裨益，也對中國大陸向以模糊帶過的處理方式，提出有力的質疑與挑戰。

**關鍵字：**鄧小平、1959 年廬山會議、毛澤東、彭德懷、大躍進

---

收件 2007 年 3 月；修正 2007 年 5 月；接受 2007 年 6 月。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E-mail: 93260501@nccu.edu.tw；cyl@ms54.url.com.tw。



## 壹、前言

因彭德懷上書使得情勢丕變的 1959 年廬山會議，無論對於當時中共高層政治和黨內生活的發展，以及對始於 1958 年的「大躍進」運動的後續走向，皆造成負面性、甚至破壞性的惡劣作用。此一在中共政治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會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鄧小平，因為健康的原因而未能出席。

中國大陸關於鄧小平的專門著作，因為鄧沒有出席廬山會議，多數對此會議未置一詞。<sup>1</sup> 即便有提到，也是極為簡略。例如：「鄧小平因腿部骨折留在北京，沒有參加這次廬山會議。」<sup>2</sup> 「鄧小平沒有出席廬山會議，此時他的一條腿由於意外而跌斷。」<sup>3</sup> 然而，鄧小平在廬山會議過程中與廬山方面可能存在什麼互動？鄧小平對廬山會議結果怎麼表態？以及影響鄧小平相關立場的因素為何？迄今仍無一專文對之進行系統討論與仔細探究。<sup>4</sup> 本文在資料甚為有限的情況下，<sup>5</sup> 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解答。

本文論點為：廬山會議前，鄧小平因腿傷而住院，但對外仍消息靈通；廬山會議期間，鄧小平對於會議情勢與發展，除可能透過閱讀文件知情外，或也作為徵詢意見的對象。鄧小平對會議結果與結論表態的情形，現有資料多是在會議結束之後，然不能排除其在會議期間即有表態支持的可能。促使鄧小平支持會議結果的因素包括：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權力結構的限制，鄧小平對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矛盾的認識，以及彭德懷相關做法本身的爭議性。

本文之目的在於：試圖勾勒出廬山會議前後鄧小平的政治意向和動因，冀以對「鄧小平研究」，特別是對「文革」前中共菁英政治中的鄧小平之認識有所裨

<sup>1</sup> 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鍾文、鹿海嘯，《百年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著，《鄧小平畫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sup>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台編著，《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86。

<sup>3</sup> 曹英、胡立國主編，《百年小平：1904-2004》，上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4 年），頁 325。

<sup>4</sup> 西方討論鄧小平的文獻，相較於中國大陸的文獻，涉及廬山會議時雖有進行討論，然也著墨不多，沒有將之開展，而且通常圍繞在鄧小平是否真的是因腿傷而無法出席會議的問題。

<sup>5</sup> 由於取得一手的官方檔案的困難，本文在資料上主要使用回憶錄與相關的研究文獻。另外，也利用作者在香港與中國大陸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為補充。然而，為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乃用甲、乙、丙、丁的代號名之。



益。文內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概有六個部分：一、廬山會議前夕鄧小平的情況；二、廬山會議召開期間鄧小平知情會議進展的可能性；三、鄧小平對會議結果表態的問題和情形；四、分析影響鄧小平支持會議結果的可能因素；五、鄧小平對待相關批判對象的態度；最後，在結論的部分，簡單探討此一討論對既有論述所提出的挑戰。

## 貳、會議前夕的鄧小平

對於鄧小平有否出席廬山會議，早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Salisbury 表示，基於對鄧小平的信任，毛澤東指示鄧留在北京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等到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局勢已定，毛才召喚鄧上廬山開會，見證此一結果。<sup>6</sup> MacFarquhar 在其著作中則認為鄧雖然去了廬山，卻在當地摔斷了腿而無法如期與會。<sup>7</sup> 還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鄧小平因為對「大躍進」政策有所牴觸，所以故意裝病不去廬山開會。<sup>8</sup>

實際的情況是，1959 年 6 月 5 日，廬山會議開始前近一個月，鄧小平在北京因打撞球不慎滑倒，造成右大腿骨折。<sup>9</sup> 事發後三小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即向毛澤東匯報此事。由於醫療人員初步判斷鄧小平臥床養傷的時間需達八週之久，毛澤東當機立斷地指示：由之前即在中央書記處協助鄧小平負總責的彭真，在鄧請假期間代行主持書記處工作，<sup>10</sup> 冀使相關業務不因鄧的掛彩而能持續進行。在此一意外情況下，鄧小平對於後來在 7 月召開的需要遠赴廬山的中央會議，只能不克出席了。

由於臥病在床，鄧小平的工作量因而有所減少。例如：6 月 11 日，在毛澤東

<sup>6</sup>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176.

<sup>7</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29 and p. 407.

<sup>8</sup> 此一「政治病」的說法，事實上難以立足。首先，鄧小平真的是因腿傷之故，需要一段時間的臥床治療；其次，廬山會議走向的突然逆轉，包括主持者毛澤東在內的所有與會者，上山開會前都始料未及，鄧小平自也無法能預知。

<sup>9</sup> 鄧小平跌傷後，即由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作緊急處理與送往醫院。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301。

<sup>10</sup>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395。



要求楊尙昆通知在京高幹閱讀一報告的批語中，毛特別指出在常委中「不通知小平、陳雲」。<sup>11</sup> 此或是毛體恤兩人正值請假、休養之際，認為彼等不用如同過往那樣事無分輕重地掛心、操勞。但是這並不代表鄧小平暫離時政，不聞國事。

對於原先負責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跌傷前正埋首於對「大躍進」進行糾偏的鄧小平而言，「人疲心不疲」，必然持續對新近的發展感到關心。<sup>12</sup>

事實上，「足不出戶」的鄧小平仍然與外界保持密切的聯繫和互動，不會產生與時事脫節的情形。最顯著的例子是楊尙昆來院探望的頻仍。從鄧小平 6 月 5 日夜住入醫院起，楊尙昆先後於 6 月 6 日、7 日、9 日、10 日、16 日，甚至在 22 日，亦即楊尙昆為廬山會議的召開作準備先行前往廬山的前一日，皆赴院看望鄧小平。<sup>13</sup> 可以想見，敘病情外，向鄧小平通報黨內外的最新情況和動向，自是楊尙昆在病榻邊與鄧耳語的主要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對「大躍進」以來的各種怪現象頗有怨言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也曾於 6 月 24 日來醫院看望鄧小平。<sup>14</sup> 其探望鄧小平的前三天（6 月 21 日）還與彭德懷交換過意見。張、彭二人一致對 1958 年 9 月北戴河會議以後一段時期「左」的錯誤所造成的後果感到憂心，也曾論及黨內政治生活的問題。<sup>15</sup> 張聞天有否藉此探病之機，將其與彭德懷交換的看法向鄧小平報告並討論，雖無法得知。但「不長於交際」、「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張聞天，<sup>16</sup> 此次竟主動「登門造訪」鄧小平，甚有可能與其在 6 月 20 日討論報刊宣傳問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 6 月 23 日（即探訪的前一日）商議如何對內外講清楚目前困難形勢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受氣有關。

<sup>11</sup> 〈對上海市委關於副食品、日用工業品問題的報告的批語〉。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301。

<sup>12</sup> 以大煉鋼鐵為例，自 1958 年底以來，鄧小平在幾次中央的會議上皆提出降低 1959 年鋼鐵指標。在鄧小平跌傷前一週，亦即 5 月 28 日，其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更表示：「全面安排，解決工農、輕重關係，眼睛只看到 1800 萬噸，就會把全面丟掉，包括丟掉人心。」然鄧小平持的是「糾而不洩」的立場，並非反對「大躍進」總的方針、政策。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當代中國研究》，2006 年第 2 期（總第 93 期），頁 101-102。

<sup>13</sup> 楊尙昆，《楊尙昆日記》，上冊，頁 395-401。

<sup>14</sup> 張培森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頁 1145。

<sup>15</sup>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頁 1144-1145。

<sup>16</sup> 張聞天重要的助手何方回憶：張聞天「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作去主動看人。」「如果說他對毛有點兒敬畏，可對少奇、總理、陳雲、小平等大多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年），頁 95、196。



因為在相關會議上，張聞天主張講實情，「把目前的困難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向人民講清楚」，並認為掩飾缺點並不能鼓勁。但張的發言卻旋即遭到反對，被責備為講喪氣話，是對形勢估計悲觀的一種右的論調，並強調要在兩條路線上開展鬥爭。對此，張聞天難掩憤慨，甚至激動地當場與對方發生爭執。<sup>17</sup> 雖然不能臆測鄧小平當時對張聞天作何回應，但鄧小平確可經此認識到黨內高幹內部圍繞在如何看待「大躍進」的問題上，所可能存在的歧異。

除了經由他人的來訪了解最新的時勢，鄧小平住院乃因腿部的問題，雖無法參加公開或外事活動，但並不影響其思維與工作的能力。以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繁重，雖然有彭真出面因應，但在廬山會議前鄧小平也逐步地恢復部分的工作。<sup>18</sup> 總體而言，在廬山會議即將召開的前夕，鄧小平雖然不良於行，但對外在情況無疑仍保持耳聰目明。

### 參、會議期間鄧小平知情之可能性

一般通稱的廬山會議，係包括兩個會議：第一個會議是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會議情勢的演變，此一會議又可分作兩個階段：7 月 2 日至 16 日彭德懷信印發，即所謂的「神仙會」；7 月 16 日至 8 月 1 日，會議從「糾左」和「反右」的對立突轉為「反右傾」。第二個會議是 8 月 2 日至 16 日召開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以下即按會議舉行的時序，對鄧小平與會議之間可能存在的互動，進行檢視和爬梳。

首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一個階段。

亦即廬山會議猶是「神仙會」之時，上山赴會者「勞逸結合」，開會之餘也遊山賦詩；包括鄧在內的留駐京畿者，也難能落得數日清閒。鄧小平不致也無須對會議特別關注。然而，「好景不常」。1959 年 7 月 14 日，彭德懷的信送予毛澤東，毛澤東在醞釀一日後開始有所動作。7 月 16 日，一方面，毛澤東將彭信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另一方面，毛澤東對於會議進行的方式和參加人員，也另有安排。除將山上人員重新編組討論

<sup>17</sup>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頁 1144。

<sup>18</sup> Uli Franz, *Deng Xiaoping* (Bost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 p. 152.



外，毛澤東也致信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請尙在北京的高幹如彭真等人至廬山參加會議。對於未上山的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在信中也提出「請徵詢陳雲意見」，是否可能前來，但是又強調「能來則來，不能則不要來」。<sup>19</sup> 此外，毛在電話上還告訴彭真說，「如果林彪身體情況許可，請他也一起上山。」<sup>20</sup> 毛澤東未提及鄧小平，最直接的原因即是鄧小平斯時行動不便、無法成行的關係。

對於廬山正在發生的微妙變化，鄧小平或不甚明瞭。因為留守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彭真在接到通知上山時，也尙不曉廬山發生何事。<sup>21</sup> 然而，毛澤東此番「調兵遣將」的不常舉動，勢必讓先前慣常協助毛澤東料理會議事務的鄧小平，<sup>22</sup> 感到事態有異。

其次、也就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二個階段。

此一階段會議的轉捩點是 7 月 23 日毛澤東「炮火四射」的講話。在毛講話之前的一星期中，針對彭德懷信的內容和觀點，在廬山與會人士之間隱然出現分流：既有一支對之持肯定或基本認同的輿論。主要人物包括：原本留守中央軍委、與彭真同是後來被徵召上山的國防部副部長兼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上廬山前恐已與鄧小平抱怨過的張聞天，也在 7 月 21 日作長篇發言予以呼應。另外也存在一股對彭信不表贊同和意見相左的一股力量。由於毛澤東尙未明確表態，同在廬山的其他中央領導人如周恩來，也不以為意地表示「那沒什麼吧！」<sup>23</sup>

約此同時，在北京療養復原中的鄧小平，雖然還不能走動、露面，但可能因原在京留守書記處的彭真於 7 月 17 日上廬山，所以應已更多地參與處理中央日常工作。<sup>24</sup> 廬山會議開始後，鄧小平不因缺席而為人所忘。此點可從周恩來在廬山上的言語中反映出來。向來洞悉黨內人際動態的周恩來，在此前一年才因「反冒進」而遭受批判，<sup>25</sup> 對於高層權力關係格外敏銳，由於深深感受到這時的鄧小

<sup>19</sup> 〈關於請彭真等來廬山參加會議給劉少奇等的信〉，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 358。

<sup>20</sup>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第二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頁 362。

<sup>21</sup>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南方網：<<http://61.144.25.119/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mzd/underling/200312210629.htm>>。

<sup>22</sup> 馮治軍，《鄧小平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2001 年），頁 101-107。

<sup>23</sup>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375。

<sup>24</sup> 余伯流，《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84。

<sup>25</sup> 「反冒進」係指 1956 年在國務院主導下對經濟建設指導方針所作的調整，其強調綜合平衡、穩步發



平甚為毛澤東所倚重，7月21日，周恩來在廬山召開國務院各部長彙報會時，針對落實指標的問題，即曾表示：「過去總書記下決心，現在總書記不在，我們要分勞。」<sup>26</sup> 其對鄧的看好和尊重，意在言中。由此可見，截至當時，鄧小平既有的權勢依舊在，未因其不在場而減損。

在16日彭德懷的信交諸黨內討論至23日毛澤東表明態度的一週時間內，鄧小平甚有可能已閱讀到彭的信。以董必武的情況來說，董於7月2日到廬山參加會議，7月20日因要參加國務活動離開廬山返抵北京。後來應八屆八中全會召開的需要，董必武又再上廬山。董必武在8月3日表示：「我因事於7月20日回到北京。同陳毅、王稼祥、劉瀾濤幾個同志談過，彭德懷的信只有幾個論點不太對。」<sup>27</sup> 根據此一資料，可以判斷的是：董必武在北京與陳、王、劉一起討論彭德懷的信的內容，顯示當時留在北京而沒有前去廬山的陳毅等人，已看過毛所轉發的彭信，所以才能就此加以交談並且認為彭德懷信中所指僅有個別處有待商榷。同在北京的鄧小平，自應也看了彭德懷的信。

鄧小平對彭德懷信的內容，初步所抱持的想法又為何？葉劍英後來的回憶提供了一個線索。葉劍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評論毛澤東時曾表示：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萬言書。一開始，我、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以及總理都覺得彭所言是對的。但後來，在主席寫信、發出指示並講了約一個小時後，我們都改變了態度並站在毛主席那邊攻擊倒楣的彭德懷。<sup>28</sup>

亦即，據葉的說法，在毛表明立場之前，對彭德懷信的內容，鄧小平原初至少也是持以比較正面的評價，尤其是彭在信中對於「大躍進」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的批評，鄧也有所同感。<sup>29</sup>

---

展。但相關方針和主張人士在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起到1958年春一再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認為其影響經濟建設的進展，有損群眾士氣，在政治與經濟上都帶來不良後果。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首當其衝，甚至曾為此提出辭職。

<sup>26</sup> 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1475。

<sup>27</sup> 《董必武傳》撰寫組，《董必武傳：1886-197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011。

<sup>28</sup> "Senior Cadres' Appraisal of Mao Tse-tung," *Issues & Studies*, Vol. XVI, No.5 (May 1980), p. 77.

<sup>29</sup> David Shambaugh,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Sep., 1993), p. 470.



時至 7 月 23 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後，不但讓彭德懷覺得「當頭棒喝」，<sup>30</sup>更對廬山會議形同投下一枚震撼彈。會議氣氛益趨嚴峻，議程也重新設定，甚至反其道而行。原定的經濟調降、糾偏難以為繼，代之以另一波的誓言躍進。「一小撮」的標靶被豎立、鎖定後，「一面倒」的態勢業已形成。會場上，欲藉機成就事業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地窮追猛打，勢狼如待敵，如對「大躍進」政策極為支持的地方領導人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本有己見者，不想見風轉舵、落井下石，也得說出違心之語，如薄一波上廬山時準備的是有關「大躍進」問題的資料，鑑於會議批彭的走向，薄不欲批評彭信的內容，只好批評彭的歷史問題。<sup>31</sup>至於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數名自認出於一片忠心好意、卻被解讀為「猖狂進攻」者，雖曾嘗試負隅頑抗，但終淪入「打破眾人捶」的田地。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地繼而提出擴大規模續開中央委員全會，也就是廬山會議中的第二個會議一八屆八中全會，既要確定先前「戰果」，也要補抓「漏網之魚」。

未能身臨現場的鄧小平，對於會議產生質變的發展，是否會因「身隔萬叢山」而產生「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情形？若參照陳雲的例子，也應不至如此。

林彪在 7 月 29 日當援兵、登廬山「保駕護航」後，在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僅剩鄧小平和陳雲沒有上廬山。在大連療養的陳雲頗能了解會議的進展狀況，可見諸其規勸同在大連修養的鄧子恢不要前往廬山開會為證。當鄧子恢接到通知要去廬山開會（也就是八屆八中全會），即徵問陳雲，「陳雲告訴了鄧子恢廬山會議的一些情況，勸他不要去。」<sup>32</sup>從而使得已屢次在農業、農村問題上開罪於毛的鄧子恢躲過一次政治風暴。由此可知，對於廬山會議從毛澤東「攤牌」後急轉直下的「風向」，陳雲即便不是了然於胸，也「雖不中亦不遠矣」。

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陳雲是經由閱讀廬山會議文件，了解到廬山會議情況的。<sup>33</sup>同屬政治局常委等級的鄧小平，在會議「豬羊變色」的這一階段，也應可

<sup>30</sup> 彭德懷即表示，毛的相關講話猶如「給我一悶棒。」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745。

<sup>31</sup> 薄一波，〈不能忘卻的懷念—回憶彭德懷同志〉，《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10。

<sup>32</sup>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33。

<sup>33</sup> 金沖及、陳群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1193。



與陳雲一樣地閱讀到相關的會議文件，即時掌握會議的走向。況且，陳雲在黨內雖官拜副主席，常委排名高於鄧小平，但陳雲因「反冒進」而在 1958 年遭受毛澤東的嚴厲批判，雖然未罷官，但也因此一度失去實權、打入冷宮。相形之下，鄧小平迭次獲毛拔擢、「搏扶搖而直上」，在 1959 年 4 月的八屆七中全會上，甚至被毛稱作「副總司令」、「副元帥」，若無准獲得相關的資料、訊息，豈非咄咄怪事。<sup>34</sup>

除了可以藉由獲取、閱讀會議文件的方式，粗判廬山會議走向，廬山方面也會主動與因故而未出席的重要高幹聯繫。易言之，當時會議內部的情勢和狀況，並非全然遭到封鎖，暫時移駕廬山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乃是有計畫地與未能親臨此會的高級要人進行意見交換。例如：羅榮桓當時雖也因病而未出席廬山會議，但在會議期間（應是會議即將從政治局擴大會議轉入八屆八中全會的前後），<sup>35</sup>彭真從廬山打電話給羅榮桓，除了「通報會議情況，並說，毛主席準備讓林彪來接替彭德懷國防部長的職務並徵求未出席會議同志的意見。」<sup>36</sup>

1963 年，羅榮桓病故，毛澤東曾以「國有疑難可問誰」嘆之。<sup>37</sup>鄧小平在毛澤東的人脈網絡中的地位和信任，也可堪比擬。鄧小平在歷史上是所謂的「毛派」，其也是毛澤東在中共「八大」時刻意提攜「登台演主角」的「少壯派」之一（其他者如陳雲、周恩來都有『錯』在身）。<sup>38</sup>鄧小平常委兼總書記的政治地位明顯高於政治局委員的羅榮桓，又同是中央軍委委員，自也有可能作為被通報會議情況並徵求意見的重要對象。<sup>39</sup>

此外，針對廬山會議走向的突轉，參加會議的人員為避免其下屬幹部與部門

<sup>34</sup> 一名資深的中國大陸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者（甲君）對作者指出：中共的高級領導幹部除非有重大的政治問題，不然皆能有閱讀中央文件的權利。以鄧小平當時在中共黨內的重要政治地位，必定能收閱相關的會議發送文件。

<sup>35</sup> 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793。

<sup>36</sup>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頁 563。黃瑤、李志經、楊國慶，《羅帥最後十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94。

<sup>37</sup> 〈七律 悼羅榮桓同志〉。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475。

<sup>38</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520。

<sup>39</sup>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表示：廬山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決定要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繼續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按照中共黨內程序，會通報鄧小平；也會跟他講此前會議的情況。



在不明情況下犯錯，故不乏有在會議期間即經由電話告知會議的情況。<sup>40</sup> 鄧小平在中共黨組織中所處的重要位置，理應「朝中有人」，有更多的渠道向之通風報信。

綜上所述，對於彭德懷等人在廬山上所犯「錯誤」和被揭發的「問題」，以及「以林代彭」的重要人事變動，鄧小平在廬山會議尚未全部「圓滿閉幕」之時（至少在八屆八中全會開始前後），就應已知情了。

## 肆、鄧小平對會議結果表態之問題和情形

### 一、會議期間鄧表態的可能性

廬山會議的逆轉，最主要肇因於毛澤東個人的乾綱獨斷和上綱上線。毛甚至揚言「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sup>41</sup> 以示其不惜決裂的意志。為遂行其「非友即敵」的意念，一方面，毛澤東在自己的講話中「故作文章」，藉以拉人、組織隊伍；另一方面，毛澤東也密切注意別人的發言和態度是否與己意相符，務使眾生「無所遁形」。

首先、毛澤東在廬山「說古道今」論證黨史、「數風流人物」臧否黨人之時，經由會議文件的飛送傳閱，未與會者也能「親炙」毛澤東的「教誨」，進而「知所進退」。例如：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的講話中，將在會議期間出現的對「大躍進」的「右傾思想」同1956、57年的「反冒進」聯繫起來，說當年「反冒進」的人「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反冒進的一些人，這次站住腳了。」毛澤東還有意地強調：「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sup>42</sup> 毛澤東這種「言者有意」的「隔空喊話」，的確收到「輕言重聽」的震懾效果：已是「待罪之身」的陳雲，對於廬山會議的結果因此「不便也不能公開表示不同意見」。<sup>43</sup>

<sup>40</sup> 例如：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8月2日，亦即八屆八中全會開始當天，向省委電話傳達毛澤東關於反右傾、鼓幹勁的講話精神。總政治部的蕭華，也約此前後，從廬山打電話告訴在北京的李逸民：「現在廬山會議方向已轉，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江渭清，《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43。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90-191。

<sup>41</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鄭州：河南省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34。

<sup>42</sup>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的講話紀錄，1959年7月23日。金沖及、陳群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陳雲傳》，下冊，頁1192。

<sup>43</sup> 金沖及、陳群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陳雲傳》，下冊，頁1193。



就現有可得的資料，毛澤東在廬山批彭的諸次講話中，也曾提起鄧小平。不同於以「聽者足戒」警示陳雲的方式，毛澤東提及鄧小平時，側重於對之拉攏、置於麾下之意味。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轉開八屆八中全會的前兩日，亦即 7 月 31 日、8 月 1 日，毛澤東主持兩次常委會，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在 8 月 1 日的常委會上，毛澤東回溯其早年在江西「整我狹隘經驗主義，山上無馬克思主義」的經歷時，提到「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sup>44</sup> 亦即先以「子弟兵」的定位，將鄧小平劃入所謂「國王人馬」的行列；再者，毛澤東更以「代言人」的姿態對彭德懷表示：鄧小平在你面前有顧慮，對你並非沒有意見。<sup>45</sup> 面對毛澤東的代鄧「控訴」，彭德懷回覆：小平幾次不當軍分會主席。說我有英雄主義。毛澤東在「引蛇出洞」後，更進一步地發揮運用，強調鄧小平批評彭德懷的「是說資產階級英雄主義」，而非較好的「無產階級英雄主義」。更強調彭所犯的這種「個人英雄主義很危險，野心即出在這裡。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組織隊伍。」<sup>46</sup> 顯而易見地，毛澤東蓄意地操作鄧小平與彭德懷在抗日期間華北共事經歷中曾有的不愉快經驗。<sup>47</sup>

毛澤東為不在場的鄧小平向彭發出「抱怨」，是因為毛、鄧兩人以前曾為此議論過，或者是毛在作此發言前曾徵詢過鄧的意見後的結果？抑或是毛澤東根本假借鄧小平之口批彭？對此無法予以求證。然而，毛此舉確可借鄧的名義，進一步地「證成」彭德懷不但是「不才明主棄」，更「多病故人疏」，淪落至遭到包括鄧小平在內「萬夫所指」的困境。

因為這兩次常委會都沒有正式紀錄，<sup>48</sup> 遠在京畿的鄧小平，能否得知毛在會上的相關言論尚且存疑。但在鄧小平缺席、即使有異議也無法當庭澄清的情況下，毛澤東這種以其名「代勞上陣」的做法，無論鄧小平是否知曉、同意，至少能產生將鄧小平夾帶上其批彭「火線」、納入其「反右傾」陣營的印象和作用。

如果說毛澤東在常委會攻彭時提到鄧小平，只是在小範圍內為之，聞者不

<sup>44</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86。

<sup>45</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95。

<sup>46</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96。

<sup>47</sup> David S. 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62.

<sup>48</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995。



多；毛澤東之後更不忘在中央全會上帶上鄧小平的名字，在全體中央委員面前為毛自己的言行「背書」。8月11日，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期間一次大會上的講話中批評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成員，組織宗派、進行分裂活動。毛表示：「那些同志」「跟許多人合作，中央常委六個，『俱樂部』的同志沒有一個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對我而已。如果單只反對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個，還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sup>49</sup>

其次、在廬山「大是大非」之前，中共高幹的相關作為與舉動，皆難逃心細如髮的毛澤東的「法眼」。可援以毛澤東對待朱德、胡耀邦為證。在批判彭德懷的問題上，對於調性溫和的朱德，毛澤東竟然在朱還在講話之際，當面做出抬腿摸鞋面的動作，以「隔靴搔癢」諷之。<sup>50</sup> 8月16日，廬山會議在對《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進行表決時，朱德彎曲胳膊、手舉半高的姿勢，毛澤東會後都要「關照」一番，指朱「舉手舉了半票」。<sup>51</sup> 臨時接到通知趕赴廬山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胡耀邦，在大會上始終保持沉默，僅在小組討論時簡單說些無關緊要的話。經由每日仔細閱讀會議簡報，對於胡此種不甚積極的態度，毛澤東瞭若指掌，感到不悅。胡耀邦回憶：「從那以後，主席有一兩年不大理我。讓我坐了冷板凳！」<sup>52</sup>

有論者指出，在中共政策、路線形成的過程中，對於其他高層要人而言，掌握、洞悉毛澤東本人的動向至關重要，及早而準確地表態不但有助於鞏固政治地位，更能獲得毛的賞賜和晉升。<sup>53</sup> 廬山會議期間，在毛澤東警視各方反應下，無論是基於對毛澤東決定的信任或是自我生存的動機，會議缺席者主動地致電廬山或以其他的行動表態支持的例子不少。例如：8月13日，徐海東「由北戴河來電話，表示他擁護總路線，反對軍事俱樂部。」<sup>54</sup> 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劉瀾濤，也迎合上意，8月2日從北京寄送《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

<sup>49</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96。

<sup>50</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85。

<sup>51</sup> 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頁55。

<sup>52</sup>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60-161。

<sup>53</sup>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2-53.

<sup>54</sup>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19。



運動》，被毛澤東用來當作向著「右派朋友們」發射「一大堆連珠炮彈」的「機關槍」和「迫擊炮」。<sup>55</sup>

鄧小平呢？其能置身廬山事態事外、對毛澤東的決定置若罔聞？鄧小平因傷而無參加廬山會議，避過了在會議前期必須對難測的政治風向加以判斷的難題，亦閃過了在會議後期「面對面」當場表態和尷尬應對的處境。迄今為止雖無任何直接的資料說明鄧小平在廬山會議期間有否表態以及如何表態，<sup>56</sup>但鄧小平身近層峰「高處不勝寒」，對於廬山所發生的情事恐怕又不是毫不知悉（如前所述地，鄧除能閱讀到毛澤東批發的有傾向性的中央文件，更有可能會被主動告知和徵詢），在廬山發展形勢逼人的情況下，至會議「曲終人散」之前，鄧若僅作「壁上觀」而不「選邊站」（而且要選擇站在毛這邊），其要承受的政治壓力和風險，簡直是不可想像。<sup>57</sup>

## 二、會議結束後鄧表態支持的情形

現有足堪反映鄧小平對廬山會議結果表態支持的資料，都是在廬山會議結束、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班師回朝」以後。

首先、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之情況。

8月18日至9月12日，爲了在軍中傳達並貫徹八屆八中全會的決定，肅清彭德懷、黃克誠在軍隊的影響，北京舉行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揭發、批判彭、黃的「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有資料指出，鄧小平參加此次會議，甚至加入批判。<sup>58</sup>此若屬實，亦暫無法辨認鄧小平是施以「言之有物」重量級的批鬥或「行禮如儀」表面式的批評。

<sup>55</sup> 「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51-455。

<sup>56</sup> 「文革」期間，在對鄧小平展開大批判中，鄧在此問題上也多受質疑與責難。例如：被所謂「造反派」指爲「裝成若無其事」，「連一份書面發言也不寫」；蕭華更在軍級幹部會議上批評鄧在廬山會議批評彭德懷時，態度非常消極。這是鄧小平不願留下文字紀錄或其他因素，恐怕是一樁歷史的懸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老實話》、《遵義曙光》編，《鄧修外傳》，1967年，頁22。

〈蕭華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17日）〉，中國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org/viewarticle.php?id=2718>>

<sup>57</sup> 一名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學者（乙君）對作者指出：廬山會議期間，由於是中共中央定調後才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以鄧小平在中共高層所處的核心地位—七名常委之一並兼任中央總書記，至少在全會召開以前，鄧小平一定要有「必要的表態」，而且是表態支持。

<sup>58</sup> 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E.Sharpe, 1998), p. 145.



值得注意的是，在軍委擴大會議的後期，9月9日，劉少奇蒞會發表「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和「關於所謂個人崇拜問題」的談話。其中，劉少奇表示：「我這個人歷來是提倡『個人崇拜』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sup>59</sup>

劉少奇將鄧小平與毛澤東、林彪並列為「個人崇拜」的對象，表示在黨中央經歷「右傾」份子「逼宮」的挑戰與危機後，鄧小平仍然跟得上黨中央「正確」的領導和路線，猶可作為全黨學習的「典範」和「楷模」。這或可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鄧小平在批彭、「反右傾」中採取的態度和舉措，是受到層峰認可、「過關」的。

此外，9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會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此次軍委成員調整乃是因應根除所謂「軍事俱樂部」後的一次組織變動。其中，鄧小平獲任為軍委常委，亦顯示鄧小平仍佔有一席之地，其在軍中的地位未受廬山政治風波所影響。

其次、在《紅旗》雜誌上的撰文。

鄧小平為蘇聯《真理報》所寫、並刊載在10月1日出版的《紅旗》上的〈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一文，是目前唯一公開的鄧小平在廬山會議後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書面文字。其中指稱：

我們黨內的少數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看不見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偉大成就，竭力誇大群眾運動中的那些已經克服了的缺點，借以非難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1958年的大辦鋼鐵運動對於我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積極作用，在實際生活中愈來愈明顯，而他們卻以為這個運動只能起破壞的作用；人民公社已經在總結了初期的經驗以後進一步成長和健全起來，而他們卻以為人民公社正在「倒退」，只有解散人民公社才是唯一的出路；廣大人民群眾都認為我國國民經濟的躍進的局面好的很，而他們卻認為「糟得很」。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

<sup>59</sup>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05-306。



點，顯然不過是害怕群眾和敵視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在我們黨內的一種反應。<sup>60</sup>

在同一期的《紅旗》中，劉少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與林彪的〈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予以撻伐。鄧小平與劉、林口徑一致，齊聲對之譴責。

再次、共同參與對彭德懷的約談工作。

10 月 13 日，毛澤東約見彭德懷。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朱德、陳毅、彭真、李富春、譚震林等陪同在座。<sup>61</sup>「一起同他（彭德懷）商量以後一段時間的學習問題」。<sup>62</sup> 10 月 21 日，毛澤東再次約談彭德懷並共用了午膳。有資料指稱「常委各同志都到」，<sup>63</sup> 鄧小平或也陪同在座。鄧小平乃是與黨中樞同樣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場，不吝對「犯錯誤」的彭德懷做工作，促之悔悟、自新。易言之，鄧小平與黨中央看待彭的問題的立場，基本上是所去不遠、甚至是如出一轍的。

## 伍、影響鄧小平表態之可能因素

廬山會議如同中共黨內高層一次「刀口浪尖」般的政治攤牌與鬥爭，「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鄧小平因足疾而無法出席。但是鄧小平終須面對「選對邊」明哲保身或「政治失足」而跌入深淵的零合式（zero-sum）的抉擇。結果證明，鄧小平選擇跟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接受廬山會議的結果。影響鄧做出如是決定的因素主要如下：

### 第一、權力結構的制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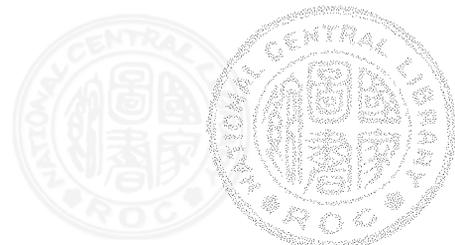
在毛澤東主政時期，中共高層政治的權力結構和其下成員的互動關係，是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運轉型態。毛澤東與其他成員之間傾斜不平的權力分配，決定了

<sup>60</sup> 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紅旗》，1959 年 19 期（總第 33 期），頁 30。

<sup>61</sup>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頁 390。

<sup>62</sup>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753。

<sup>63</sup>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38。



此一政治體系內可能的行為選擇和往來模式。當毛澤東尚無定見時，其他領導人可表達自身的政策偏好並從事遊說；但須盡可能地揣度毛的意圖。因為俟毛清楚闡明立場後，他人難有置喙的餘地和重議的機會，放棄己見、信從緊跟是廣續生存之必要抉擇。<sup>64</sup> 對此，自 1952 年從四川上調北京、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數載的鄧小平，定有深刻的體會。

毛澤東針對彭德懷在廬山大發雷霆，擺明欲將彭徹底打倒，縱使是羅織罪名也在所不惜。對此，鄧小平即便僅想袖手而不插手、遠觀而不介入，直是不可能之事。尤有甚者，如前所指出的，毛澤東在廬山上「御駕親征」對彭德懷清算時，也將鄧小平捲入鬥爭（當然也不能簡單認為當時鄧小平是完全處於被動的姿態）。<sup>65</sup> 因此，除非鄧小平願意犯「龍顏」、冒「逆鱗」之大不韙，旗幟鮮明地表態支持廬山會議的結果，實是最合乎理性計算下的產物。「文革」以前的鄧小平，不論其自身先前的立場為何，最終皆卑屈從屬（slavish subordination）於毛澤東在重大問題上的決定和主張，亦即是不顧原則，只講求有效率的執行（unprincipled bu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sup>66</sup> 鄧小平對廬山會議也不外乎於此。

然而，需要著重指出的，鄧小平對於廬山會議全盤否定、殘酷鬥爭的做法，並非毫無自己的看法與意見。宋任窮回憶，廬山會議後，其與國務院幾位部長呂正操、張霖之、彭濤一起去醫院看望鄧小平。探望期間，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向鄧講了會議後期批判彭德懷的一些情況。鄧小平沉思片刻後說：

彭德懷同志歷史上是有功的，在平江起義、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鬥爭中都有很大的功勞，不論他有什麼錯誤。這些功勞都是應當充分肯定。<sup>67</sup>

<sup>64</sup>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13-14, 229.

<sup>65</sup> 「文革」初，毛澤東在批評鄧小平時曾指出：「59 年 8 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辦法的。」現在看來，毛澤東當時所言是不合實際的，因為廬山會議正由其一手主導。然而，毛在批鄧時提及廬山會議，是否顯示不在廬山會場的鄧小平，也曾與開會議發展、甚至獻策，頗耐人尋味。（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10 月 24 日）），《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4 年複印出版），頁 655。

<sup>66</sup> Barry Naughton,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 1993), pp. 492-497.

<sup>67</sup>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351-352。



在鄧小平簡短的言論中，不否認彭德懷是犯有錯誤的；但是鄧小平對於廬山會議上一筆抹殺彭德懷過去革命歷史的做法，並不予以苟同。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鄧小平是在接受、不觸動「大局」的前提下，於私下場合針對批彭若干的細節、技術問題「別有洞見」。事實上，這種對彭德懷激烈鬥爭內心稍帶保留者，也並非僅有鄧一人。被毛澤東召上廬山擔綱批彭德懷的彭真，在 1959 年 10 月中旬即對彭德懷表示：「廬山會議對你鬥爭過了一點分。」<sup>68</sup> 沒有參加會議、留守國務院的陳毅言論更是突出，其在會後甚至跟薄一波說：「黨內有不同意見，應該讓別人講。不能提點不同意見，就說成是反黨，是右傾機會主義，那樣誰還敢講話，還談得上什麼黨內民主！」<sup>69</sup> 然而，快人快語的陳毅去看望彭德懷時，竟還是跟彭說：「老兄想開些，大局為重吧！」<sup>70</sup> 如此的現象，更加突顯的是，在毛澤東對廬山事件拍板、定案後，包括鄧小平在內鮮少有人膽敢公然試以違逆的形格勢禁。

鄧小平贊同廬山會議結果所牽涉的責任問題，恐不僅在扈從式（bandwagon）「一般的表態」。因為彭德懷被批的一大「罪狀」，即在被指控參加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甚至言之為「彭、高聯盟」。對此，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已感「難以下嚥」，<sup>71</sup> 廬山會議後仍念茲在茲，認為此問題與「裏通外國」皆是其難以默默承受的。在整肅高、饒的過程中，鄧小平是關鍵的揭發者與參與者，鄧小平在晚年也以當事人的身分為此事作證。<sup>72</sup> 對於一度在相關問題上認識模糊的彭德懷，正是鄧小平出面向之說明、告以「正途」。<sup>73</sup> 甚至彭德懷在「高饒問題」上的發言內容，亦也是經鄧過目、修改。<sup>74</sup> 彭德懷在 1962 年 6 月

<sup>68</sup>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754。

<sup>69</sup> 薄一波，〈回憶陳毅同志的二、三事〉，《領袖、元帥、戰友》，頁 146。

<sup>70</sup> 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總身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56。

<sup>71</sup> 1959 年 8 月 12 日，彭德懷表示：「現在要我徹底交代高饒問題的錯誤和軍事俱樂部，就是這兩個問題難過關。」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747。

<sup>72</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325-331。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135-145。

<sup>73</sup> 1954 年 1 月 24 日（或 25 日），鄧小平向彭德懷談高崗和饒漱石的反黨聯盟活動。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566。

<sup>74</sup> 1955 年 3 月中旬，彭德懷寫信並將關於高饒問題的發言稿分送中共中央有關同志。鄧小平在稿子上寫道：「彭總：你的發言稿，我作了個別的改動，並送主席、少奇、陳雲同志看了，他們都認為好，主席還作了一點修改。現退回，修改處是否妥當，請酌。」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7。



所上訴的「八萬言書」中，也強調當年鄧小平同他談話時，當即將高崗的一些情況，「如實地告訴鄧小平同志」，證明自己與高、饒沒有什麼「反黨集團」性質的關係。<sup>75</sup> 然而，廬山會議期間和會後，在彭德懷是否涉入「高饒」一案上，沒有證據顯示，作為知情者的鄧小平，當時在此一問題上曾替彭有所說明或辯護。鄧小平即便不是無動於衷、視若無睹，也是緘默無語、任之而去。

## 第二、鄧對毛澤東、彭德懷之間矛盾的認識

毛澤東在廬山對彭德懷勃然大怒、憤而將之罷黜背後的原因中，<sup>76</sup> 乃涉及毛、彭兩人長期以來在治軍上敏感的矛盾和歧見。較諸中共其他文職的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更能領悟、了解毛澤東何以一不做二不休地取下彭德懷的掌軍之權。

鑑於「波匈事件」中軍隊不穩的教訓，以及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因位高權重，引起蘇共領導人忌憚而在 1957 年 10 月遭到整肅之事件的影響，毛澤東對於中共軍隊的穩定性和服從性高度地注意和小心。尤其是中共軍中的實力派人物如主軍的彭德懷的動向和忠誠問題。<sup>77</sup> 1958 年 5 月至 7 月，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展開反「教條主義」的批判與鬥爭。彭德懷雖是「反教條」的主事者之一，但可能正是毛「殺雞儆猴」、「敲山震虎」的對象。後來同在廬山會議中「中箭落馬」的黃克誠即言：

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後，開始擔心我軍領導出問題。也許這就是廬山會議的前兆。<sup>78</sup>

因應「大躍進」逐步啟動的需要，1958 年初鄧小平即著手參與改變軍隊落後地方的被動局面。<sup>79</sup> 在毛澤東的委派下，鄧小平更銜命擔任軍隊「反教條主義」

<sup>75</sup>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 498。

<sup>76</sup> 毛澤東對彭德懷在私人問題上也存有不滿，例如：毛之子在韓戰中陣亡，領軍作戰的彭德懷被視有保護不力的責任。作者感謝審查人就此點所作的提示。

<sup>77</sup> 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百年潮》，2004 年第 2 期，頁 30-34。

<sup>78</sup>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第 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95。

<sup>79</sup> 1958 年 3 月，鄧小平在成都會議上批評軍隊幹部因無深入群眾、實際而思想落後；並與彭德懷交換意見，以促改變軍隊被動的局面。對同月下旬訓練總監部（被視為『教條主義』大本營）幹部會議的走



領導小組組長，<sup>80</sup> 直接過問進而主導相關運動的推行。其中，毛澤東對彭德懷是否懷有貳心有所顧慮時，鄧小平多少是能略知一二。

另外，在軍事事務和國防建設上，毛澤東與彭德懷各自的政策主張也存有不容小覷的殊異，有時甚至引發兩人當面的爭執和口角。<sup>81</sup> 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軍委委員，在毛澤東的授意下經常代表黨處理軍隊相關事務。易言之，鄧小平在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多次擔任聯絡、傳遞的中間人的工作。對於毛、彭政策上的歧見和紛爭，鄧小平自知之甚詳，甚至曾被捲入相關的爭議漩渦中。<sup>82</sup>

承上所述，鄧小平深諳毛澤東在「槍桿子」問題上對彭的疑忌和嫌隙。因此，對於毛澤東在廬山上對彭德懷發怒並欲藉機順勢摘下其兵符，以一了百了的意圖和決心，鄧小平應是能予以揣摩而更不敢橫加阻撓的。

### 第三、彭德懷相關做法的可議之處

首先、彭德懷行事自認擇善固執，不重時機、策略與效應。

毫無疑問地，彭德懷和其「餘黨」敢為民喉舌之心，可敬也可憫。然而，彭德懷在方法、對策上的確有失周詳。有關彭德懷寫信給毛的動機，據同樣在廬山「落難」的周小舟指稱，彭德懷覺得：「中央常委之間，少奇同志當了國家主席之後更不便說話，恩來、陳雲同志犯過錯誤不能說話，朱德同志意見較少，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了解情況不多，不甚說話，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說。」<sup>83</sup> 因此，由他來寫這封信最合適。彭德懷「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昭然若揭。然而，彭德懷只

向，鄧小平批評「方向不對，風氣不正，水平太低」。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56-257、261、266。

<sup>80</sup> 張震，〈在小平同志領導下作戰與治軍〉，中央文獻研究室、解放軍檔案館編，《回憶軍事家鄧小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28。

<sup>81</sup> 曾任國防部長彭德懷辦公室主任的王焰表示，廬山會議前，毛對彭因誤解而不滿主要有三件事：一、毛幾次提出欲將義務兵役制改為志願兵制度，在全國實行義務全民皆兵的民兵體制，彭表現不積極，甚至還同毛當面進行爭論。二、1958 年炮擊金門期間，彭德懷請假至哈爾濱視察、軍隊對敵散發傳單內容有誤，引毛不快。三、從 1952 年至 1959 年，彭德懷自覺年事已高、知識不足，曾四次向毛提出辭職的要求，為毛所不悅。擔任彭德懷秘書的鄭文翰也表示：彭在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面，主張實行軍銜制、薪金制和義務兵役制度等，毛都表示過不同意見，不要軍銜牌牌，恢復供給制和搞全民皆兵。陳宇，〈彭德懷的軍事秘書談彭德懷〉，《軍事歷史》，1998 年第 5 期，頁 8-9。

<sup>82</sup> 有關兵役制的問題，1958 年 4 月 8 日，「在鄧小平支持」並主持擬寫的中央決議獲得通過，明確「現行的義務兵役制不變」。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676。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37、243。

<sup>83</sup> 周小舟給毛澤東的信，1959 年 8 月 13 日。金沖及、陳群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陳雲



看到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說話、行動上的不便性，卻無了解後者「按兵不動」、「以靜制動」的權益考量。

由毛澤東率性發起的「大躍進」，「不撞南牆不回頭」，也只有毛澤東才可以將之轉彎。其他領導人實際上不是未敢搶先或曾也是「頭腦發熱」，鄧小平在「大躍進」初期的積極和熱衷，就是一例。<sup>84</sup>事實上，從1958年底至廬山會議「神仙會」的這段時期，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雖慢但也開始醒覺、思考，進而採取動作放緩步伐、著手糾偏。對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都已有覺察並感擔心的鄧小平等人（誠如彭德懷所觀察到的），<sup>85</sup>就是設想順水推舟地將經濟逐步導回正常軌道。

按捺不住的彭德懷，猶如「半路殺出程咬金」，狀似「要追究個人責任」。<sup>86</sup>不但激怒了毛澤東，更驟然中斷黨得來不易的自省，繼續主觀地將「大躍進」推動下去。如此使得鄧小平等人原本的「如意算盤」付之一炬、毀之一旦，就算不遷怒於彭德懷，對彭的莽撞也難免生怨。1961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回顧「大躍進」以來的情勢時就表示：

三面紅旗是對的，總路線是對的，我們缺乏那麼一套，一個缺乏一套具體政策，一個叫調整遲了一年。59年廬山會議碰到了鬼。本來廬山會議是調整會議，鋼調整到xxxx噸，反對的是左，鑽出這麼一個鬼，大家一股勁，越搞越猛。<sup>87</sup>

鄧小平話中所言的「鬼」，無疑指的是彭德懷上書所引發的事端。鄧即認為正因「鑽出這麼一個鬼」，使得經濟不但沒獲及時調整，還「越搞越猛」，讓調整的時間遲後一年，造成更大的困難。

---

傳》，下冊，頁1188。

<sup>84</sup> 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頁98-100。

<sup>85</sup>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頁362。

<sup>86</sup> 王光美評論劉少奇在廬山會議的作為時表示：「雖然少奇同志認為，彭總信中所說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反映問題，即使有些意見說得不對，也不算犯錯誤，但他並不贊成彭總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要大家表態站在哪一邊，這不是要導致黨分裂嗎？」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01。

<sup>87</sup> 〈鄧小平在接見參加團中央工作會議全體人員時的講話（1961年10月23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糾鄧兵團編，《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第二集，1967年，頁51。



其次、彭德懷的直率性格和直言直語，有其真性情樸質的一面，但在詭譎多變的政治中，則易生誤己壞事的後果。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觸犯天條」，與此不無關係。鄧小平對此也有所看法。據鄧力群回憶，對於造成廬山會議轉折的原因，「一種因素，小平同志對此也講，彭老總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的地方。」<sup>88</sup>

這方面例子很多如：彭德懷在信中所提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被批評為暗諷毛澤東。對於四個月前甫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會議上講過「毛澤東可學而不可及」的鄧小平，<sup>89</sup>此無異是有損「領袖威信」的「出格」言語。會議期間，彭德懷曾被揭發講過「困難繼續下去，也許只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毛澤東對之反感，也引發眾怒、群情激憤。由於蘇聯對於中共發起的「大躍進」，持以不甚看好的態度，激起中共的民族主義情緒，更燃起為之拚搏的鬥志。1958年8月，中共決定全黨全民大辦鋼鐵時，鄧小平就特別強調煉鋼指標是「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的」。<sup>90</sup>彭德懷這種「長人志氣」的貿然失言，傳到經略中蘇關係、領教過對方「大國沙文主義」苦頭的鄧小平的耳中，<sup>91</sup>恐怕也頗難入耳。

再次、彭德懷處事不留餘地、不假情面，徒招人怨而不自知。

1958年旨在「反教條主義」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過去與鄧小平在戰場「搭檔演出」多年的劉伯承，被列為批判的對象。<sup>92</sup>眾所週知的是林彪批劉的高調和狠勁。事實上，彭德懷相較林彪在對劉批判的力道上也毫不遑多讓。<sup>93</sup>會議因而加溫，迫使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趕赴北京參加會議並帶病檢討。批判劉伯

<sup>88</sup>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102。

<sup>89</sup> 李銳，《李銳談毛澤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頁104。

<sup>90</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29。

<sup>91</sup> 鍾延麟，〈鄧小平在中蘇關係中之角色與作為（1956~1976）—兼論對『鄧小平研究』之意義〉，《中國大陸研究》，第48卷第4期，2005年12月，頁85-110。

<sup>92</sup> 李曼村、陳煥、黃玉章主編，《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663-668。

<sup>93</sup> 彭德懷在會上表示：「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彭更將批劉「教條主義」結合歷史舊事，直稱：「不要忘了，紅軍時期，教條主義可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毛澤東順彭附合地說：「教條主義真是害死人喲！」彭德懷指控劉伯承之事乃是：中共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四方面軍曾將一批軍、師幹部送到由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時任紅四方面軍三十軍軍長的余天雲因學習不適、甚而引發爭吵，促使劉伯承親自處理事。余氏卻因不服管教而自殺身亡。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2005年第1期，頁31-32。



承雖是毛澤東的意思，但是彭德懷帶刺激、煽動性的語言和翻陳年老帳的做法，對於與劉相近的鄧小平而言，恐不會沒有心生任何的反感，<sup>94</sup> 甚至耿耿於懷、留下芥蒂。因為事隔十四年，在林彪外逃失事後，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對林彪進行揭發時，回顧此事猶對彭德懷批評劉伯承的方式有所批評：

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視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裡起作用。<sup>95</sup>

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換成彭德懷淪落「階下囚」。在對之大批判的場合中，雖不必然有人會挾怨報復，<sup>96</sup> 但是對於彭德懷僅一年後即從批判者變成被批判者，心作「此一時、彼一時」感慨者確實不在少數。<sup>97</sup>

## 陸、鄧小平對相關被批判人士之態度

對於在廬山會議上遭到批判的人士，鄧小平在事後是如何與之互動的問題，既可反映鄧對會議決議的堅定性，也能藉以觀察鄧對於政治上倒臺者（特別是由毛澤東決定）之行為準則。

廬山會議之後，除了會對宋任窮等表示過些許想法外，鄧小平看待彭德懷的公私態度，皆相當有分際。人際上，鄧小平對其個人與彭德懷之間的來往，非

<sup>94</sup> 1958年「反教條主義」期間，毛澤東曾考慮撤換劉伯承政治局委員職務。對此，鄧小平表示異議，並為毛所接受。7月19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會議上講話，指出要公道地對待劉伯承：「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們是老搭檔了，你說他犯了錯誤，我心理那麼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這幾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過去不好。不能說他多年來做的不是好事。如果這樣說，不公道。」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91、294。

<sup>95</sup>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8月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

<sup>96</sup> 在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被批鬥而被解除總參謀長一職的粟裕，上廬山參加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期間，有人向其建議將前一年其受錯誤批判一事乘機會提出，粟表示：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自己的問題，並表示：「我決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頁635。

<sup>97</sup>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頁462。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頁159。



常謹慎。劉少奇與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結束後不久曾有私人之間的會晤。<sup>98</sup> 鄧小平方面，除了前述的以黨中央集體的形式一同接見彭德懷外，似無資料顯示鄧小平曾私下與彭德懷見面。對於彭德懷妻子浦安修因丈夫政治問題而出現的情緒問題以及在工作上遭受刁難的情況，也無作出任何表示。<sup>99</sup>

有關彭德懷的生活安置問題，鄧小平請示毛澤東裁定。<sup>100</sup> 政治上，鄧小平更是「唯毛是瞻」，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態度調整其對彭的冷暖。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會」公開強調「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8 月，毛澤東在同地區負責人談話時又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同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更決定針對彭德懷設立中央專案委員會，對其進行全面審查。<sup>101</sup> 在對彭處理愈加緊縮的氣氛下，11 月 29 日，鄧小平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監察工作會議上也說：「毛主席、少奇同志講，不怕公開的反對派，怕搞鬼。」「彭德懷、習仲勛不是公開的反對派，是搞鬼。」<sup>102</sup>

時至 1965 年 9 月 23 日，毛澤東約見彭德懷，向彭表示「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並決定派其去西南參加「三線」建設。<sup>103</sup> 鄧小平自然隨之轉換態度，改而對自認不適任的彭德懷進行勸說。鄧小平既同聲贊成彭赴任，表示「搞工業都不懂，都在摸索」以降低其顧慮，更對彭說「我們都盼著你重振雄威，為人民再

<sup>98</sup>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115-117。

<sup>99</sup> 彭德懷的妻子浦安修對於彭在政治上犯錯誤感到難以適應，曾向楊尚昆反映。浦安修在北京高校工作，也因彭德懷的問題遭人閒語。無論是經由楊尚昆或彭真，鄧小平都能知道浦安修的情況。浦安修提出要同彭德懷離婚，彭真不敢批，轉問鄧小平。鄧表示：家務事不管。亦即鄧小平雖不贊成浦與彭德懷離婚，但也沒對浦的情況講些話以改變其之處境。此乃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提供的意見。另可參閱：滕敘充，《風雨彭門：彭德懷家風、家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年），頁 248。

<sup>100</sup> 廬山會議後，彭德懷致信楊尚昆，提出欲搬離中南海一事。楊尚昆收到信之後，隨即請示鄧小平；鄧小平再請示毛澤東。毛同意中央辦公廳的決定：彭德懷同志的政治待遇不變，仍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辦公室撤銷，可保留秘書一人，組織關係安排在中央黨校。生活待遇也不變，仍配備工作人員。9 月 30 日，彭遷出中南海住所。張樹德，《毛澤東與彭德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241。

<sup>101</sup>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頁 405-409。

<sup>102</sup> 鄧小平，〈在組織工作會議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2 年 11 月 29 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1967 年 10 月，頁 69。

<sup>103</sup>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88-289。



建新功！」<sup>104</sup> 10月6日，鄧小平會見彭德懷時對之表示：「業務上大家都是外行，政治上照主席說的要互相信任。」<sup>105</sup> 由於毛澤東責成鄧小平、劉少奇協助彭德懷至四川就職。10月16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西南局領導「打招呼」，會上，當彭德懷仍強調「我根本沒有反黨罪行。」鄧小平回以：「你過去意見可以保留，今後好好幹，保持晚節就行了。」<sup>106</sup> 1966年1月17日，解放軍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批評羅瑞卿對軍隊建設造成不良影響時，也以彭德懷為例子表示：「對那些犯錯誤的人，也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彭德懷還可以分配他的工作，並且寄予希望。」<sup>107</sup>

然而，隨「文化大革命」爆發，鄧小平自身也難保而被迫下臺。鄧小平在自身的政治低潮中所作的政治檢討裏，鄧在挖掘自身歷史錯誤，尤其是在所謂「太行工作時期」，論及彭德懷之處，皆以廬山會議時對彭的揭發內容為準。例如：「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鬥爭」，「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贊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彭德懷在太行分局的一次幹部會議上，「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採取了調和立場」，「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sup>108</sup>

此外，廬山會議期間由於當事人當面對質的情況下，1930年代中共長征途中的會理會議，彭德懷有否逼毛澤東交軍權一事，因林彪的坦承，終獲得澄清，還彭清白。<sup>109</sup> 鄧小平在「林彪夜遁逃、大火自焚燒」<sup>110</sup> 後向毛澤東所寄的信中仍

<sup>104</sup> 鍾灝編著，《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縱覽（1938-1965年）》（北京：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53。

<sup>105</sup>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790。

<sup>106</sup>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791。

<sup>107</sup> 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研究所編印，《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匯編》，1967年，頁5。

<sup>108</sup> 〈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1972年8月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109</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89。

<sup>110</sup> 此乃時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在得知林彪出走失利身亡後所改寫的詩句。其全文為：「月黑雁飛



表示：「在長征時，他（林彪）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是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聯。」<sup>111</sup> 易言之，就鄧小平當時的文字，其猶認為彭德懷在長征過程中有反毛的行徑；林彪參與此事本身已有錯外，他夥同「壞人」彭德懷，更是錯上加錯，直是一項值得被揭發的嚴重錯誤。

鄧小平以其自身曾與聞彭德懷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來作「觸及靈魂深處」的自我剖析；以別人在歷史上和彭德懷合作共謀的情形，作為對之揭發的依據。此乃因彭德懷既是毛澤東囑意下的「鐵案」，鄧小平為了以示對毛的忠心，對於彭德懷這一政治上的「死老虎」，「照本宣科」、甚而加以發揮，實是題中應有之義。

相比於對彭德懷的刻意保持距離，鄧小平對於「軍事俱樂部」的二號人物黃克誠則有較多的關切。例如：1959 年 12 月底，鄧小平曾指示楊尙昆，要副總參謀長楊勇、海軍政治委員蘇振華、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委員李志民「去看看黃克誠」。<sup>112</sup> 1975 年 1 月，黃克誠因病需急送醫院但受阻撓，黃的妻子寫信給鄧小平，鄧馬上批示下來，讓黃得以入院接受治療。<sup>113</sup> 這種差異可能最主要是毛澤東在廬山震怒的鋒芒所指是彭德懷，以後毛澤東也是一直親自掌握彭德懷的情況，鄧小平無緣置喙，自也不敢做主干涉。在廬山會議上，黃克誠算「陪綁」而非「主犯」，況且無論在中央軍委會或中央書記處，黃克誠皆屬鄧的下級，長官對舊時部屬的關懷係屬正常，而不致讓人作其他的聯想。

對於在廬山上被毛澤東稱作與彭德懷是「文武合璧」的張聞天，鄧小平的態度，較諸對彭、黃，是同中又有小異。無疑地，影響鄧小平對張聞天的態度最重要的原因，即是毛澤東對張的態度。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崛起的過程中其與張聞天關係的演變甚為曲折：既有上下關係的對調，也有「正確路線」代表人讓所謂「教條宗派」者伏首臣服的內容。毛對張略帶鄙夷的態度，在高層內部並非新聞，鄧小平也應有所耳聞。毛澤東在廬山上對張的恣意笑罵，更是最集中的一次

高，林彪夜遁逃。無須輕騎逐，大火自焚燒。」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台北：正中書局，2002），頁 116。

<sup>111</sup>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 年 8 月 3 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112</sup> 楊尙昆，《楊尙昆日記》，上冊，頁 457。

<sup>113</sup>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 344。



表現。

張聞天在政治上垮台後，毛澤東對於此一昔日同僚仍是予以遙控而不放手。例如：1960年年初起，張聞天數次寫信給毛澤東表達要求工作的意願，但都無下文。張聞天主動找鄧小平面談，請求安排工作，鄧建議張「研究國際問題吧，你熟悉。」<sup>114</sup>之後，劉少奇又以對中蘇關係應予以迴避為由，要張聞天改行經濟工作，但仍然未成。最終去中國科學院下屬一學術研究機構經濟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sup>115</sup>可見張聞天的出路安排，是直接掌握在毛澤東之手。張聞天妻子劉英因張被批而受到波及，也是在毛澤東示意下才免被劃為右派。<sup>116</sup>對此，鄧小平甚為明白，不會也不想特別聞問。

但鄧小平對張聞天比對彭、黃又有些不同，可言更為冷淡。因為沒有資料顯示，會議後鄧小平曾為張聞天說過類似其曾為彭德懷略作緩頰的話，或是要人去看望黃克誠一樣地去探視張。尚不論鄧小平與張聞天在1933年「中央蘇區」反「羅明路線」、反「鄧、毛、謝、古」一事的歷史恩怨，<sup>117</sup>是否在其中起了作用。彭德懷等在中共「馬上得天下」過程中長年奔波於沙場，有苦勞、更立下彪炳功勳。對此，鄧小平認為不因其政治有誤而全遭抹殺，要「應當充分肯定」。這是歷史上扛有「教條主義」包袱、向來拿筆桿子的張聞天所不能與之相比的。<sup>118</sup>

<sup>114</sup>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頁200。

<sup>115</sup>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頁430。

<sup>116</sup> 劉英因其夫張聞天的關係在外交部內遭到圍攻。劉英不滿便致信毛澤東上訴。1960年3月20日，毛批示：「劉英信。請恩來、陳毅、安子文、帥孟奇各同志一閱，然後送交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閱，然後交尚昆存。劉英問題是否應與聞天的問題的處理有所區別，請你們辦理研究，適當處理。」在毛澤東有傾向性的批示後，劉英得到嚴重右傾和嚴重警告的處分，而沒被劃為右派。《劉英紀念集》編輯組、無錫市史誌辦公室，《劉英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頁145-146。

<sup>117</sup> 1933年，張聞天初從上海轉移到江西南部的「中央蘇區」，即馬上積極投入反對以毛澤東主張為基礎的「羅明路線」的活動。3月下旬，張聞天以中央局代表身分出席江西省會昌、尋鄔、安遠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在會上作「政治報告」與「結論」。在張聞天的指導下會議作出決議，批評會、尋、安三縣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心縣委領導（鄧為縣委書記）執行「羅明路線」。4月15日，張聞天所撰的《羅明路線在江西》發表，公開點名批評鄧小平，並以此為出發點發動以反對鄧、毛、謝、古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鄧小平被撤銷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被給予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當時的妻子也因此離開他。程中原，《張聞天傳》，頁108-111。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年），頁258-27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335-337。

<sup>118</sup> 此乃中國大陸一名當代中國史研究者（丁君）提供的觀點。



## 柒、結論

由於 1959 年廬山會議的結論，乃是毛澤東「欽定」下的結果，直至毛澤東撒手人寰為止，都無人敢嘗試予以翻案，鄧小平自也不例外。毛去世後，鄧小平有了政治自主性，開始著手處理廬山會議的錯誤結論以及相關受害者的平反工作。鄧小平先是逐步地起用遭廬山會議株連獲罪的幹部，例如：洪學智、萬毅。<sup>119</sup> 之後，更同意並參與對廬山會議中被打擊的主要人物的平反。1978 年 12 月 24 日，鄧小平出席彭德懷的追悼會並致悼詞，其中，鄧親自加上了「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的評價。<sup>120</sup> 以慰死者並正視聽。鄧小平後來也指出：

1959 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志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儘管彭德懷同志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志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sup>121</sup>

1979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鄧小平親致悼詞，表示張是「忠於黨、忠於人民」，要為其「平反和恢復榮譽」。<sup>122</sup>

鄧小平對廬山會議結論的「撥亂反正」，確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此基礎上，回顧 1959 年廬山所發生的政治風雲、繼之而起在全國浩浩蕩蕩展開的「反右傾」運動，以及另一波「大躍進」的推動，也無須為尊者諱。鄧小平不但

<sup>119</sup> 廬山會議時擔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的洪學智，因受此事牽連被降職下放至東北。1977 年 8 月，總後勤部副部長張震寫信給鄧小平推薦洪學智。後經軍委秘書長羅瑞卿與鄧小平商量，決定讓洪出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頁 134-135。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頁 694-695。

1977 年 7 月，作為「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相當重要成員之一」的萬毅（參加廬山會議時，身分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在軍中擔任武器裝備科研工作部門的領導），向中共中央提交一要求重新歷史並希望分配工作的報告，鄧小平批示：「既無政治歷史問題，就應做恰當安置，他過去有貢獻。」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269。

<sup>120</sup> 葉永烈，〈彭德懷平反歷程艱難〉，香港文匯報網：[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xw0512230016](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xw0512230016)。

<sup>121</sup>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59。

<sup>122</sup> 〈在張聞天同志追悼會上鄧小平同志致悼詞〉，《人民日報》，1979 年 8 月 26 日，版 2。



不是那種所謂「與我無關」、毫不知情的「桃花源中人」，以其當時的政治地位與選擇餘地，鄧小平更有可能是無役不與、身不由己的「江湖中人」。<sup>123</sup> 這或許是鄧小平晚年所指稱的「毛主席犯過的錯誤我也有份」其中的一個部分，亦或是文章一開始所指相關記載迄今仍寥寥數語、草草幾句的最深層的原因了。

---

<sup>123</sup> 例如：彭真在 1962 年在檢討「大躍進」錯誤時曾指出：1960 年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大出口，基本建設也是 1960 年搞得最多。1960 年的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頁 107。



## 參考文獻

〈在張聞天同志追悼會上鄧小平同志致悼詞〉，《人民日報》，1979 年 8 月 26 日，版 2。

〈蕭華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 年 3 月 17 日）〉，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engewang.org/viewarticle.php?id=2718>>.

中央文獻研究室、解放軍檔案館編，《回憶軍事家鄧小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台編著，《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著，《鄧小平畫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

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研究所編印，《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匯編》，1967 年。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 年）。

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4 年複印出版）。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1967 年。

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

江渭清，《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年）。



- 余伯流，《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
-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
-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南方網：<<http://61.144.25.119/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mzd/underling/200312210629.htm>>。
- 李曼村、陳煥、黃玉章主編，《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 李銳，《李銳談毛澤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鄭州：河南省人民出版社，1995年）。
- 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頁30-34。
- 金沖及、陳群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 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 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糾鄧兵團編，《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第二集，1967年。
-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台北：正中書局，2002年）。
-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
- 張培森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 張樹德，《毛澤東與彭德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曹英、胡立國主編，《百年小平：1904-2004》，上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4年）。

清華大學井冈山兵團《老實話》、《遵義曙光》編，《鄧修外傳》，1967年。

陳宇，〈彭德懷的軍事秘書談彭德懷〉，《軍事歷史》，1998年第5期，頁2-9。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第二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

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總身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馮治軍，《鄧小平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2001年）。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黃瑤、李志經、楊國慶，《羅帥最後十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

葉永烈，〈彭德懷平反歷程艱難〉，香港文匯報網：[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xw0512230016](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xw0512230016)。

《董必武傳》撰寫組，《董必武傳：1886~197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

《劉英紀念集》編輯組、無錫市史誌辦公室，《劉英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



出版社，2005年）。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紅旗》，1959年19期（總第33期），頁26-3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滕敘亮，《風雨彭門：彭德懷家風、家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

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2005年第1期，頁26-32。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鍾文、鹿海嘯，《百年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

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總第93期），頁94-105。

鍾延麟，〈鄧小平在中蘇關係中之角色與作為（1956~1976）—兼論對『鄧小平研究』之意義〉，《中國大陸研究》，第48卷第4期，2005年12月，頁85-110。

鍾灝編著，《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縱覽（1938-1965年）》（北京：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Franz, Uli, *Deng Xiaoping* (Bost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

Goldstein, Avery,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Naughton, Barry,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 1993), pp. 491-514.



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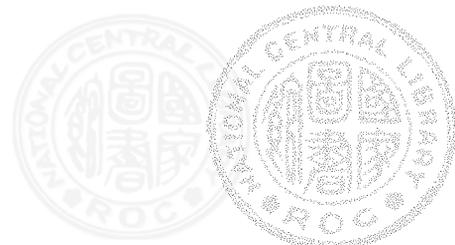
“Senior Cadres’ Appraisal of Mao Tse-tung,” *Issues & Studies*, Vol. XVI, No.5 (May 1980), pp.76-78.

Shambaugh, David,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Sep., 1993), pp. 457-490.

Teiwes, Frederick C.,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Yang, Benjamin,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E.Sharpe, 1998).

Goodman, David S. 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4).



# Deng Xiaoping and 1959 Lushan Conference

Yen-Lin Chung<sup>+</sup>

## ABSTRACT

The Lushan Conference in 1959 was very important ev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Deng Xiaoping, then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was absent from the conference due to his broken leg.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Deng Xiaoping actually didn't attend the Lushan Conference. However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Deng not only might have known what had happened in the conference, but also may have showed his support to Party Chairman Mao Zedong's decision to launch an attack on the alleged Peng Dehuai's "anti-Party clique." during the term of the Lushan Conference. Deng decided to support the Lushan Conference conclusions due to the constraint of the structure of power and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n and Peng, the faults of Peng's controversial strategy and behaviors.

**Keywords:** Deng Xiaoping, 1959 Lushan conference, Mao Zedong, Peng Dehua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

<sup>+</sup>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93260501@nccu.edu.tw; cyl@ms54.url.com.tw.

